

## 从?理斯《?英字典》的修?看国?的近代化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andarin in Giles'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著者	? —?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文化交渉 :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 :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ast Asian Cultures
volume	12
page range	69-80
year	2022-11-30
URL	<a href="http://doi.org/10.32286/00027675">http://doi.org/10.32286/00027675</a>

# 从翟理斯《华英字典》的修订看国语的近代化

杨 一 鸣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andarin in Giles'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YANG Yiming

## Abstract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was a leading British Sinologist, a former diplomat in China, and a professor of Sinolog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 first edition of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as published in 1892, and the second edition in 191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s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Giles's life, and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British Sinology circles and in the West in general.

The second edition is not a mere reprint of the first edition; the ontological section increased from the original 1354 pages to 1736 pages. So far, when scholars talk about Giles'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r about the revision of the two editions, they mention what Giles wrote in the preface, but there is no detailed discussion of what was added to the new edition and where the changes occurred. The end of the 19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a period of intense chang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compa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of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 analyze the increase in new words and meanings, which is important when discuss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Keywords** : 翟理斯、《华英字典》、近代化

## 一、翟理斯与《华英字典》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是英国著名汉学家, 曾任驻华外交官, 剑桥大学汉学教授, 他于1867年来华, 在北京开始学习汉语。在他早期的学习经历中, 除了使用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的《五车韵府》与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的《语言自述集》外, 也使用中国人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学习汉字。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学习经历, 翟理斯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的典籍, 编译过《三字经》, 《千字文》等大量经典文献。翟理斯一生著作、译作、文章甚多, 曾两获“儒莲奖”, 主要著作有《字学举隅》, 《汉语无师自明》, *The Hundred Best Characters* (下称:《百个最好汉字》),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下称:《华英字典》) 等。翟理斯的一生并不随波逐流, 曾对威妥玛, 卢公明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5) 等诸多学者提出过批评意见, 而他的语言文字观也是十分独特的。

《华英字典》的第1版出版于1892年, 出版社是别发洋行 (Kelly & Walsh Ltd.), 第一版全书包含46页的导论和1415页的主体部分。导论的前13页是序文, 包含 Number of Characters (汉字数量), The Characters (汉字), Numbering (编号), Duplicate characters (多音字), Phonetic Arrangement (音序排列), Orthography (正字法, 拼音法), The Tones (声调), The Dialects (方言), The Definitions (释义), The Entries (词条), Etymology (词源), Grammar (语法), Difficulty of Chinese (中文之难), Personal (私人专栏), 共14项内容, 简述了该字典的编排。后33页名为 Philological Essay, 对汉语的方言, 送气音, 音调等各问题进行了论述。主体部分的最后包括一些附表, 具体为: Insignia of Official Rank (官阶徽章), The Family Names (姓氏), The Chinese Dynasties (中国朝代), Topographical (地形), The Calendar (历法), Miscellaneous (杂项), 之后是 The 214 Radicals (214部首表), Radical Index (部首检索表), Difficult Characters & Short-Hand (难字与简写字)。在“汉字数量”一项中, 翟理斯谈到自己的字典共收录了10859个独立的汉字, 中国的一张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大概是6000个。在“拼音法”里, 提到这本字典采用的是威妥玛的拼音方案, 虽然威妥玛的拼音方案有许多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 但翟理斯还是采用了这一方法, 原因有两个<sup>1)</sup>: 1) 这本字典主要是提供给英国驻华领事馆的成员们使用, 他们都是从《语言自述集》开始学习中文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熟悉的方式。2) 使用一个公认的拼音体系, 毫无疑问有它的好处, 并且现在官话的代表是北京方言。

除了常规的释义与词条外, 翟理斯还在许多小地方做出了设计, 每一个汉字的下方都一个编号, 很多驻华的领事馆也把这个编号用作电报码。汉字的右上角标有阿拉伯数字的1-4, 用来表

1) Herbert Allen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Kelly & Walsh Ltd., 1892, p.vi.

示音调。汉字下方“R”后的汉字是音韵，使学生们可以在《佩文韵府》中找到它们。同时，在更下方的英语字母则代表在不同方言里的发音，共包括广东方言（Cantonese），客家方言（Hakka），福州方言（Foochow），温州方言（Wenchow），宁波方言（Ningpo），北京方言（Peking），中原方言（Mid-China），扬州方言（Yangchow）和四川方言（Ssuch'uan dialects）有的还包括韩语（Korean），日语（Japanese），安南语（Annamese）的发音，翟理斯提到这一部分主要参考的是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这些发音也是方言研究的宝贵材料。随着翟理斯《华英字典》的出版，外国学生们又多了一本值得信赖的工具书，《华英字典》不光可以用作字典，也是学习汉字，汉语短语的材料，因此外国学生们几乎人手一本。《华英字典》被认为是翟理斯一生的最大学术成就，也是英国汉学圈乃至西方人汉语研究、汉字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 二、《华英字典》的修订

《华音字典》的第2版出版于1912年，第2版并不是初版的单纯重印。翟理斯在第2版卷首加了一篇新序言，谈到第2版的修订过程及一些新使用到的材料。例如音韵方面利用了《初学检韵》进行了修正。同时，翟理斯还大幅度增补了本体内容，本体部分从原来的1354页增加到了1736页。至今为止，学者们在谈到翟理斯的《华英字典》或是谈到两版字典的修订时，都会提到翟理斯在序文中写的内容，但新版字典中增补了哪些内容，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却没有细致的讨论。而从初版的1892年到再版的1912年，也就是19世纪尾至20世纪初的这20年，是汉语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通过对第1版与第2版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词、新义的增长，也是我们讨论汉语近代化时可以利用的重要材料。笔者对两版字典进行比较、统计后，总结出第2版的变化大概有以下几点。

### 1. 汉字的增加

翟理斯在第2版序文中谈到，第二版新增了67个汉字，相比第1版的10859个增加到了10926个。比较有疑问的一个点是，第1版与第2版的编号都是从1开始至13848结束，按理来说应该都有13848个汉字，而不是翟理斯说的10859个或是10926个。事实上，字典内的编号并不代表汉字的数量，而新加的这些“字”也没有占一个新的编号。这其中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所增加的应该算作新的“字形”。例如“卷”字是3146号，“勑”字是3146a号，“倦”是3147号，“勑”与“倦”相通，翟理斯给出的释义也只是“参考第3147号字”，而第一版则没有收录“勑”。因此，这里的“新增的汉字”是某些字的非常用形式。另一种情况，才是新增加的汉字，例如，第3845a号的“赚”字，它和3845号的“閩”和3846号的“豨”字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一个新字，并且编排上，3845a号的“赚”字是“han”这个音的最后一个。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多音字占了复数的编号，例如“僕”字，“p'

o”这个音是第9439号，“pu”是9473号，“p`u”是9507号。第二，或许是因为《华英字典》取得的巨大成功，编号已经被各驻华领馆编号广泛地当作电报码使用，因此不能轻易修改，导致新加的汉字或者新加的字形的只能以“数字+a”的形式出现，这种编号方式与现代的字符统一码(Unicode)性质相似。所以，翟理斯说的总数10926个汉字，是指10926个字形不同、单独的汉字，虽然“勑”和“倦”相通，但性质上它们还是不同的汉字。而字典内的编号也不是代表汉字的数量，只是单纯用作编码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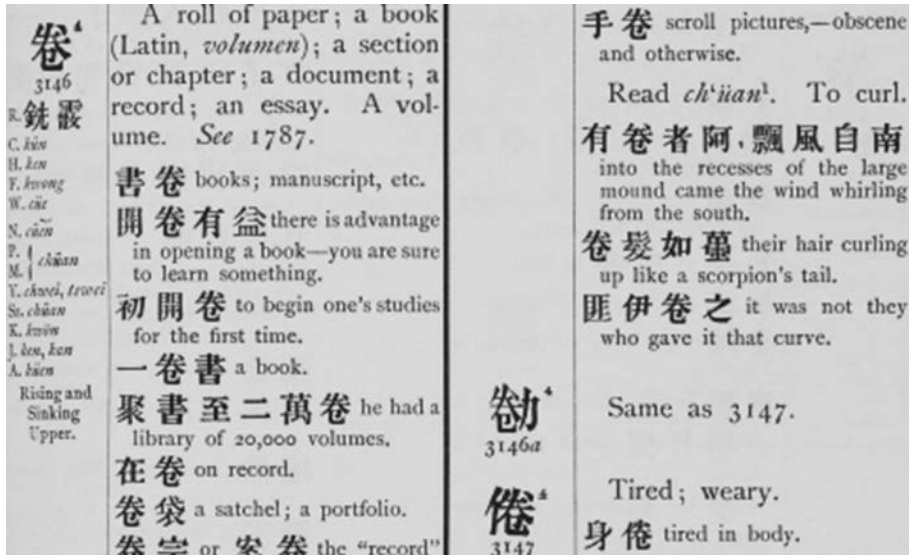


图1 “勑”的收录情况

## 2. 字义的变化

翟理斯提到，在第2版中对主要的汉字的释义进行了补充，并增加交叉引用。这一点在此举一个例子，“字”。

例	第1版	第2版
字	To love; to cherish; see No. 3471. A name or style taken at the age of twenty; see Nos. 3884, 9114. To betroth a girl. A written character; a word. See Nos. 5979, 6595, 9026, 10118, 11791.	To suckle; brood; off-spring. To love; to cherish; see 3471. A name or style taken at the age of twenty, which may be used by friends, or of one another by brothers; see 3884, 9114. To betroth a girl. A written character (explained as derivative characters <u>bred from the earlier picture forms</u> ); a word in which sense it was first used under the First Emperor, circa B. C. 220. See 5688, 5979, 6595, 6833, 7940, 9026, 10118, 11791, 13626.

如上，相比第1版，释义中增加了“to suckle”，“brood”，“off-spring”的意义，也就是“哺

乳”，“孵化”，“子孙（后代）”的意思，翟理斯所参考的应该是《康熙字典》，对应的《康熙字典》中“（说文）字，乳也”，“（左传）字者，孳也”的部分。同时，在新版中还会增加一些注释或例子，例如他提到“字”最初是从图画中衍生出来的，“字”的概念应该始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字”与“词”的概念，对于西方学者们来说是比较有争议的，有的人认为“字”就是“词”，有多少字就有多少词，这显然是一个笼统的定义，而翟理斯的划分则是比较清楚的。在他的字典里，“字”是“a written character”，“a word”都是单数形式，“a written character”更偏向于书写单位，是方块字，“a word”接近“语素”，有音与义，它们都是单数形式，而“辞（词）”是复数形式<sup>2)</sup>，是“words”，也是“speech”，“expression”更偏向口语层面的使用。从给出的例子来看，“字字有意”翻译为“each word has a meaning”，“dictionary”也不是“辞典”而是“字典”，所以我们在简称的时候，称呼他的作品为“华英辞典”大概是不贴切的。总之，对于翟理斯“词”应该是复数形式的，双音节的（bi-syllabic），他也强调汉语的口语几乎都是双音节的<sup>3)</sup>。

### 3. 词义的变化

因为《华英字典》对每个词条都进行了详细地释义，我们可以看出新义的增长，甚至这些新义已经在使用上占据了上风。例如“影响”一词：

词条	第1版	第2版
影响	Shadow and echo; tidings	shadow and echo; tidings. <u>Also, results; after-effects; consequences</u>

如上，在第一版中的释义还是物理意义上的“影子”，“回声”或者是“信息，消息”的意思，到了第二版，则增加了“results”，“after-effects”，“consequences”，开始出现“结果，后果”这类对人或事物所起的作用的意思，这个释义则与现代的“影响”基本一致了，十分接近“influence”。从近代汉语对新词吸收的角度来说，“影响”属于日语借义词，这类词的新义主要是由20世纪后通过日文翻译书籍传入的，如果对“影响”一词的使用词频做调查，也可以看出它的增长变化。笔者调查了“影响”一词，在《申报》中，从1872年至1912年<sup>4)</sup>的使用频率，如下：

2)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Vol 6, p.217.

3) 同上。

4) 《申报》于1872年4月创刊。笔者使用的是：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申报》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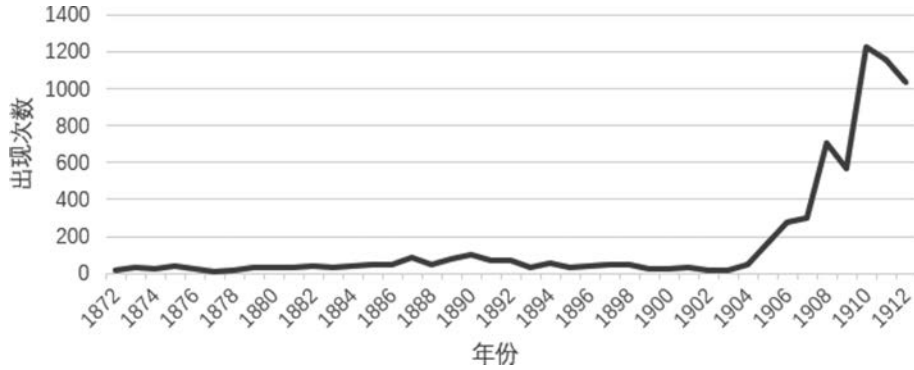


图2 “影响”在《申报》中的使用情况

可以看出在词频上，从1872年至第1版的出版时间1892年，虽然有个别年份出现次数达到了一百次左右，但平均每年的出现次数在四、五十左右，并且这一阶段“影响”的用法，还是“消息”，“音讯”的用法，例如：

1892年1月11日 《法捕房琐事》

某西人前日失去东洋车一辆，四处找寻毫无影响，当即缮函报知捕房…（后略）

1892年5月25日 《法界公堂琐案》

…（前略）方知被骗，急雇人四出追寻，毫无影响…（后略）

而出现“结果”、“起作用”的用例，则出现在1900年前后，但此时还是存在两者并用的情况：

1903年8月18日 《新译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

十八世纪之末，欧西起绝大之风潮，冲突横溢而全洲被其影响者，法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后略）

1903年8月18日 《讹传民变》

…（前略）既抵彼处，查无影响…（后略）

到了1904年，“影响”一词的使用次数开始剧增，1910年至1912年更是在千次以上，虽然在这个时期还是存在混用的情况，但新义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

“进步”一词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在两版的收录情况如下：

第1版	第2版
进步之阶：the steps for entering, — upon one's career; an opening in life	进步之阶：the steps for entering, — upon one's career; an opening in life
	初进步：to take the first step, — the first degree
	何以能谋进步：how will you be able to arrange for progress?

在第1版中，只收录了“进步之阶”一词，“进步”主要是“进一步”，“向前行步”的意思，到了

第2版，增加了“初进步”与“何以能谋进步”两条词。“初进步”中的用法还是“行步”，“步子”的旧义，而“何以能谋进步”中，则开始对译英语的“progress”，有了“向前发展，比原来好”的新义。“进步”一词在《申报》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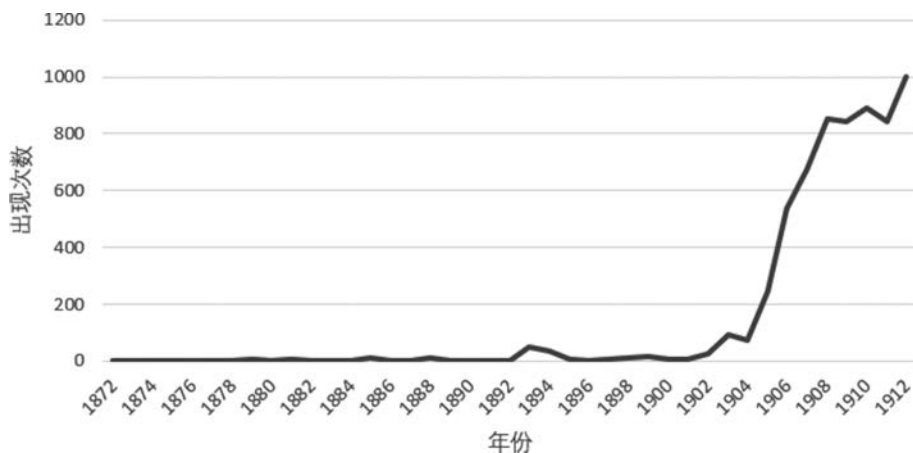


图3 “进步”在《申报》中的使用情况

同样，“进步”的出现频率在1905年开始激增。从20世纪初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这个时期的是从政治到生活，各个方面、领域，发生剧变的时期，在这样的“救国”与“谋变”的背景下，“进步”的新义也逐渐取代旧义。翟理斯收录的“何以能谋进步”应该也是摘录自某篇报道或文章。

综上，《华英字典》两版之间间隔了20年，因为详细的英语释义的存在，这些词汇所增加的新义，也是我们在研究近代词汇吸收，语义变化时，可以有效利用的材料、证据。

#### 4. 词条的增加

第2版最大的变化，就是词条的增加，前文已经提到过，第2版的主体部分增加了300余页。据笔者的统计，翟理斯第2版中共对3428个字的词条进行了增补，总共增加了12122条词<sup>5)</sup>。词条的增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的增加，也占了绝大多数；另一种，是在原有词条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例如：

第1版	第2版
急忙 in a hurry	急忙 or 急促 in a hurry
狡猾 or 狡獪 cunning; crafty	狡猾 or 狡獪 or 狡詐 cunning; crafty

5) 因篇幅限制，不能全部列出，下文对新词分类时给出的例词也不是全部。



翟理斯的《华音字典》是一本体量非常大的字典，收录的词条数要远超诸如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等前人的字典，在序文中，翟理斯给出了一个列表，对比了部分字的词条收录情况，有的字的收录数量甚至在马礼逊的十倍以上。在这些新增的词条当中，短语或俗语占了大多数，包括《康熙字典》或者其他传统典籍收录的短语、语录也收入在内。翟理斯在第1版的序文中谈到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涵盖尽可能地道的短语，从而促进汉语学习，同时还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sup>6)</sup>。同样，从第2版的修订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在遇到量词时，在第1版中，“I have met him once”的翻译是“曾过一面”，到了第2版则增加为“會過一面 or 次”也就是告诉学习者，这种场合也可以使用“次”这个量词。又比如在第2版中，增加了“一卷书 a book”，“一片烟 a cloud of smoke”等词条。对于西方的汉语学习者们，特别是初学者来说，量词的使用或是量词与名词的正确搭配，一直是个学习难点，因此在卫三畏，翟理斯等人的汉语教材都可以发现，他们会留出篇幅单独介绍中国量词的正确用法。重视口语也是翟理斯在编写汉语教材时的一个主旨。例如，在编写《百个最好的汉字》时，除了学习100个常用字外，还需要搭配学习一些常用词汇，他也谈到在学完这些字与词之后，口语水平会得到很好的提升。

除了词条的增加外，翟理斯还删除了一些词条。这其中有一部分被整合到了其他字的词条下，其他的则事被单纯删去了，或是因为释义的错误，或是因为已经很少使用，例如在第1版中收录的“甲帳 a military tent”，“周陸環瀆 a ditch surrounding the pen”等，在《申报》中，有的查不到使用用例，有的虽然可以查到用例，但每年出现次数都在个位数，像这样的词在第2版中都被删去了。

### 三、从华英字典的修订看国语的近代化

讨论国语近代化的进程，可以有很多个视角，如果我们从词汇的角度来看，近代词汇体系最明显的变化是词汇的二数字化现象，同时词汇的二数字化也符合汉语发展的趋势<sup>7)</sup>。翟理斯的两版字典，跨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清末到民初，第2版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将近7年时间左右，作为这一时期下的“产物”，翟理斯忠实的记录下了这个时期社会的词汇环境。前文简单提到了新词的词频状况，这些新词的使用频率都是在1905年前后开始发生激增的，这些新词的收录情况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用词情况，也是词汇逐渐向近代转型的证据。笔者参考沈国威（2021）的《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sup>8)</sup>，将新词中的二字词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筛选出传教士词汇与日语词汇，日语词汇又分日语借形词，日语借义词与激活词，以下为部分举例。

6) Herbert Allen Giles,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Kelly & Walsh Ltd., 1892, p.vii.

7) 沈国威，《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p 3。

8) 本文中关于传教士词汇，日语词汇的定义与下文出现的例词的具体分类，均参考沈国威的《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 1) 传教士词汇

这些词出自西方传教士，包括早期耶稣会士和后期的新教传教士们，这些词来自他们的著述或者译著，英华字典中的词语也属于这一类。有一些包含括号，是因为在字典收录的不是二字的形式，例如“担保”和“马力”，收录实际是“不敢担保”和“马力两万匹”的短语或词组的形式，属于这一类的有：

濒死，担保（不敢担保），蛋白，地产，烦琐，改良，感情，国会，国债，黑人，教徒，矿物，落后，马力（马力两万匹），默示，热度，石印，实地，首相，提出，铁轨，铁路，选民（选民资格），学位，自由，章程，枕木，主权

## 2) 日语借形词

就是词形借自日语的词。属于这一类的有：

币制，财政，裁判，草图，大量，代表（派代表），帝国，电车，电镀（电镀银的），电话，读本，工学，后天，技师，将领，空间，领海，美术，迷信（且迷信甚深），模型（飞行艇模型），目的，内容，时间，世纪（新世纪），体操，团体（领事团体），宪政，殖民，主义（以平权自由为主义）

## 3) 日语借义词

这一类在词源上是汉语的词语，可以在传统的汉语典籍，佛经中找到，近代以后受日语影响，词义发生了变化。这一类词有：

暴露，本位，表面，兵役，簿记，大学，动物，反对（妇女多反对之），高等，革命，基础，交通（交通之便利），教务，教养，经过，竞走（练习竞走方法），课程（课程表），配给，师范（师范学堂），时事，下士，宪法，相对，野蛮（见其如此野蛮），遗传

在讨论日语借义词时除了要考察中国传统典籍中的书证情况外，还需要注意它的词义变化情况，因为《华英字典》有详细的释义，方便了我们进行考察。这其中有一些词的意义还存在旧义与新义共用的情况。还有一些新收录的词，从属性上来说虽然可以算作日语借义词，但还没有发生借义的变化，例如：

发明 to explain, to make clear, to dawn

唤起 name of a bird which sings at dawn (? lark) = 春唤

从释义来看，“发明”一词还是“解释，说明”的意思，还没有近代“创造”的意义；“唤起”也是一样，还用作鸟的名字，没有“号召，引起”的意义。在《申报》中，1905年前后已经有用作

“创造”的案例了，但《华英字典》准备出版的时间是1910年，所以“发明”的新义可能刚刚普及，翟理斯没来得及将它的新义收录进去。

#### 4) 激活词：

这一类词在中国传统典籍或汉译西书中可以找到用例，词义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这些词过去不常使用。这些词在日文书籍中广泛存在，受翻译引进日文书籍的影响，又伴随某些历史事件或社会情势变化的影响，从20世纪前后开始变得频繁被使用。这一类有：

白话（白话告示），颁布，丛书，范围，分野，改变，感伤，规则（严订取缔规则），狡狴，教育（普通教育），解决，良知，旅行（新婚旅行），能力，普及，起草，认定，失败，手段，文明，肖像（某人之肖像），学费（每人每星期学费一及尼），乐队，主席，宗旨

《华英字典》的新词中有很多词是“新事物”，例如“机关车”，“电车”，“电话”等，它们是伴随中国社会近代化在出现的，在面对大量新词，新术语的出现，翟理斯也曾做出过讨论<sup>9)</sup>。他谈到汉语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部首音韵原则形成新的汉字，二是用两个或更多已有的汉字组合来表达新的概念，尽管造字这种增加的领域是无限的，但中国人一直对以这种方式扩展语言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因为这些字没有中文发音，或是会暗示一些特定的语音。因此“词”的方式，是要好于造字的。

虽然在字典的导论中，翟理斯简单介绍过日语假名，但翟理斯没有过多的日语知识，他在收录这些新词的时候，可能没有过多的意识到日语的影响，只是把它们记录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除了翟理斯，其他传教士们或一些协会组织，也对汉语新词的增加有了一定的意识，例如在1912年的《教务杂志》上，名为“Language Study”的短篇里谈到，要在刊中留出空间，列出在当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新词，并谈到已经有一些传教士收集了不少新词。在这一期的新词中包括：“条件”，“组织”，“行政”，“复杂”，“机关”，“代表”，等。这些传教士们已经意识到，要学习现在的汉语，必须要学好这些新词。

---

9)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ition, Vol 6, p.222.

儀	文	Ceremony	代	表	Representative
離	奇	Flippant	決	定	Decision
一	方	On the one hand	專	使	Delegate
威	望	Prestige	經	歷	Experience
佈	置	Arrange	個	人	Individual
提	議	Make a motion; move a resolution	機	關	Organ, function
生	涯	Life (mode of life)	立	法	Legislative
條	件	An article of a treaty	行	政	Executive
複	雜	Complicated	正	式	Formal
簡	單	Simple	主	體	Principal (principal clause, etc.)
厭	世	Pessimist	客	體	Subordinate, (con- tingent clause)
媒	介	Agent	過	渡	Transition
彈	劾	To impeach (one who impeaches)	時	局	Situation
國	事	A political offender	談	話	Conversazione
對	之	Attitude	地	點	Seat (政府地點 seat of Government)
行	受	Investiture, ceremony of	輿	論	Public opinion
組	織	Form (fabricate)			

图4 “Language Study”上的新词

除了新词方面，词缀也是一个在讨论国语近代化时应该注意的一个点，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特别是以“2+1”形式的，也就是三字词的词缀，也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词缀“性”，“化”，“界”，这样的词在第2版增加的词中，完全没有出现。其他的一些，例如代表机关，部门概念的“部”，“院”，“局”，有“瑜伽部”，“调查局”，“警兵局”；代表组织、团体的“教”，“派”，“族”，有“论定派”，“怀疑派”，“检点派”，等。总得来看，无论是新增的词条，还是本来就收录在字典中的词条，三字词是非常少的，科学术语词也相对较少，从这点点来看，此时的国语离近代的国语还有一段距离，还处在一个吸收，积累新词的阶段。

#### 四、结语

本文从翟理斯《华英字典》的编纂切入，对1892年的初版与1912年的再版，两版字典的修订进行了考察，从汉字的增加，字义的变化，词义的变化，词条的增加这四点，搭配使用《申报》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对增加的词汇进行了初步筛选与分类。《华音字典》两版间隔的20年，正处汉语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通过比较英文释义，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词义的增长与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在初探20世纪初的用词环境，讨论汉语近代化进程时可以利用的重要材料与证据。

总体来看，再版所增加的以短语，俗语居多，是因为翟理斯希望这本字典能够尽可能多得涵盖用得到的表述。除短语，俗语外，也有不少出自传教士或受日语影响的词汇。在借义词方面，有的词新义已经占据上风，取代了旧义，有的词还存在新义与旧义共用的情况，还有一些词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可以算作借义词，但实际还没有发生借义的现象。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一个重要指

标，词缀的发生，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性”，“化”，“界”，这类词都没有出现在《华英字典》当中，科学术语词也相对较少。《华英字典》第2版出版于1912年，但着手准备出版在1910年，考虑新词的收集工作，并且从翟理斯修订字典的工作进程来看，在第1版出版后就已经着手纠错及修订新版的工作，实际所反映的可以说是1892年至1910年前后的国语环境，从词汇的角度来看大概是1900年前后，距离“五四运动”还有将近10余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国语还主要处在新词的吸收与积累阶段。